

是四十年來，台灣的國語首度有機會和它的發源地有了接觸

多不宜。」當然，台灣在語文符號的選擇上，可以走自由寬鬆的路，但自己的道路是獨特、文路的特殊性，而不是一般性。用荀子的話說來，「一般性是宜」，特殊性是「不宜」。

台灣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可以爭自己的權利，有自己可以爭取的權利，但在語文符號的使用上應該保持自己的特點，而無從於紛繁多數漢藏語系間又同樣的同胞所既有的一套系統。我指出於多數時候，這不是為自己事權利，爭奪數，而是害地自限，自絕於多數。

台灣做了四十幾年國語語的孤島，此時該向普通話接軌的時候了，這個接軌的工作應該讀音的一致和書寫符號的統一。

向國語爭奪
重讀自由

談到語言問題，似乎很難和政治被曲解開，語文的改變往往被曲解為政治上的屈服。這種心理使所有在台灣成長過語拼音或簡化字的人，在規定程度上都冒著「台奸」的罪名。

這和當年「匪諜」有什麼不同呢？唯一的不同是「匪諜」